

## 【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专辑】

**编者按：**2001年6月17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举办了《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学校领导、北大出版社负责人、社会学系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负责人、校内外学者及各新闻单位记者等共30余人。各位出席者的发言有的根据记录整理而成、有的经作者补充后提供了正式书面发言稿。

潘光旦先生是我国老一代学者的代表之一，他在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民族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做出很大的贡献。《潘光旦文集》十四卷的出版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与会学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从不同角度缅怀了潘先生在作学问和做人等方面给今人所能提供的启发，我们把这些发言编成一个专辑，在这个《研究通讯》上刊印出来，以飨读者。

### 《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纪录

2001年6月17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举办了《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校领导、北大出版社负责人、社会学系（所）负责人、校内外学者及各新闻单位记者等共30余人。座谈会由北大出版社副总编张文定主持，发言者（按发言顺序）有：程郁缀、厉以宁、彭松建、马戎、苏志中、韩明谟、费孝通、王铭铭、潘乃穆、王学珍、邓锐龄、葛兆光等。

现将部分发言根据记录整理如下，凡提供有书面发言稿者单列于后。

#### **程郁缀（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部长、中文系教授）**

我首先代表何芳川副校长和社会科学部对《潘光旦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

4月27日学校召开了“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大会号召全体文科教师从“我”做起，发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清除庸品，拒绝平庸，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创造一流成果，涌现出一流学术大师，为北大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做出应有贡献。潘光旦先生是我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他的文集堪称一流学术成果。据了解这部文集收集齐全、内容丰富、校勘精良，是一部精品著作，在此我们要感谢北大出版社在出版精品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哲人虽已逝，文章照千秋。相信潘光旦先生和文集的出版，对于我校社会学系学科建设、乃至全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必将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我并不认识潘先生，只是解放前夕在南京金陵中学高中学习时读过潘先生写的《政学罪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入北京大学后，曾读过他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感到这对于研究近代江南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很有帮助，从此对潘先生做学问的踏实和细致十分敬仰。以后，在1983年又读了他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受益颇多，深感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对我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有不少启示。吴泽霖先生的序言也写得非常好。今天在纪念潘先生的文集出版的会上，我想专就中国境内犹太人的历史谈点体会。

我们都知道公元70年犹太人的国家被罗马帝国灭了，从此犹太人便分散到欧亚各地。在欧洲，当地居民因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不同，把他们看做异类。犹太人处处受到排斥迫害。许多国家和城市规定，犹太人不得置地产，不得做官，不得同当地居民联姻。有的国家强迫



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否则就驱逐出境，甚至没收财产，或被杀戮。越是以这种方式对待犹太人，犹太人就抱成一团，越具有封闭性，这样也就越被当地居民当成异类。犹太人四处流浪，但上述情况始终不变。但犹太人来到中国以后，处境就不同了。据潘先生考证，进入中国的犹太人是多次多批迁来的，并且是通过陆路、海路，经多个城市、口岸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在若干个中国城市里居住过，北宋首都开封便是当时犹太人定居的城市之一。与欧洲各国或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定居在中国的犹太人，处境要好得多。由于中华民族的宽容大度，对犹太人从不歧视。他们可以参加公平竞争的科举考试，可以进入仕途，可以买地经商，可以同当地居民通婚，从而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我 1994 年到河南开封，听开封市政府工作人员说，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学者曾来过开封，研究犹太人后裔的下落，希望找到中国的第 57 个民族，结果是发现犹太人的后裔已经融合在当地居民之中了。为什么会这样？这表明，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宽容的中华民族容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犹太人决不是惟一的例子。今天，谁还能在中原找到纯正的鲜卑人、契丹人？

从这里，我还想谈一谈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可能与古代洪水泛滥有关。治水重在疏导，处理人际关系的道理，同治水一样。堵截是治不了水患的。处理人际关系时，同样需要疏导。疏导意味着宽容，矛盾宜解不宜结，以宽容的精神来处理人际关系，化解矛盾，这才是上策。1981 年我在四川青城山填过一首《鹧鸪天》，词中写道：“洞穴深深好炼丹，迢迢千里献高官，贵人几个通灵性，道在是非一念间。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缓流总比急流宽，处世待人都如此，这就是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色。犹太人在中国境内的经历，以及河南开封犹太人最终同当地居民的融合，都说明一个宽容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在上高中时就已读过潘先生的《说童子操刀》、《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等著名论文（均收集在观察社 1948 年出版的《政学罪言》中），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与好友马雍、赵辉杰两人多次讨论过这几篇文章的要点，距今已整整 50 年，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感到，不能只醉心于“物”的研究而忽视“人”的研究。人文科学长期以来不被看成是科学，似乎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于是科学研究也就归结于对“物”的认识和对“物的控制”。这种忽视“人”、从而忽视人文科学的观念或成见，就是潘先生所说的一种“蔽”。“解蔽”包括了对人文科学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认识，包括了如何重视对“人”的研究并运用这种研究成果来影响或指导社会的前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潘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正如他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证实他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一样。

最后，我把自己在 1983 年的一首词赠给潘乃穆、潘乃谷同志，也作为对《潘光旦文集》出版的祝贺。

### 唐多令

读潘光旦先生著《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  
——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有感

国破走西东，  
谨严守祖风，



越重山、流落开封。  
科举联姻凭自愿，  
终融入，汉民中。

世路本相通，  
仁心四域同，  
海苍茫、全在宽容。  
千载悠悠思往事，  
细品味，意无穷。

（作于一九八三年）

**彭松建（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最近，我们出版社出版了 3 部比较大的著作，它们是《潘光旦文集》、《十三经注疏》（繁体版·26 卷）和《北京大学史料》。

从 80 年代开始，在老社长麻子英同志领导出版社时，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我们出版社就提出了依靠中年学者、抢救老年学者、扶植青年学者的编辑方针，一批又一批地出版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学术作品。今天大家见到的《潘光旦文集》也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由潘乃穆等几姐妹经过了多年努力收集、整理潘先生的文章，又得到了潘光迥先生的经费赞助，才得以顺利出版的。

北大出版社历来定位于努力出版教材与学术著作，历来坚持“教材优先、学术为本、创建一流”的办社宗旨，努力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在我们已出版的品种总数中间，学术著作和教材占 80%，有时甚至更多一些。我们在编辑各类学术专著时，总是力求精益求精，多出好作品，多出精品，因此，在编校质量下了很大功夫。这次出版的《潘光旦文集》，该书责任编辑沈昆朋同志在质量上用足了功夫，他是血友病患者，仍然躺在病床上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其编校质量属于上乘之作。

从出版社的管理层来说，我们采用人机并行的校对运作方式。本社一直坚持保留了校对科的体制，机构不撤，人员不散。对于每一部作品，我们除了进行人工校对之外，还坚持由校对人员和编辑人员对作品书稿运用电脑各校对两次，人工校对三、四次。这样做，有力地保证了我们拿出去的作品，其编校质量是经得起检查的，是过硬的。

我本人是研究人口经济学的，看到潘先生在那个时代对于性科学和人口学研究方面做了那么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人口学发展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感到很了不起。潘先生的成果对后人继续研究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这次座谈会，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费孝通教授，还有学校的老领导王学珍同志和郝斌同志，他们都是北大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确有宣传的目的，但更重要的在于推崇《潘光旦文集》的学术价值。

**苏志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前总编）：**

我今天代表自己和责编沈昆朋来参加座谈会，热烈祝贺《潘光旦文集》的出版。

我想用几个数字来概括出版这部文集的特点，一是这部文集为长达 600 多万字的鸿篇巨著，二是编者潘乃穆历经 23 年的搜集整理，核查和校对……工作，可以说马不停蹄，呕心沥血。三



是责任编辑沈昆明 9 年的忘我工作，他患有血友病，坐不了时，就躺着看，右手不行了，用左手干，重病缠身，奋斗不息。他曾是《世界华人辞典》责任编辑之一，一位老华侨报人、马尼拉《世界日报》总编说：老沈是位“胸襟坦然，清白一生，认真工作，不求名利”的“幕后英雄”！据我所知，经老沈编辑的书很难找出差错，他是北大出版社最好的编辑之一，所以很多教授都愿意请他编书，这部“文集”先后校对了 8 次，一旦发现了问题，他穷追不舍，需要时打长途电话查找校对。这样的“幕后英雄”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我是个老编辑，对这方面很有感触，我想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些同志的努力，老一辈的学术成果才能传授下去，并发扬光大。

#### **费孝通（北京大学教授）：**

参加这次座谈会，看到我的老师潘先生的《文集》正式出版，我非常高兴。老一代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又是向国内介绍西方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的桥梁，他们在中西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要了解中国社会的传统，就必须认真读他们写的东西。我有一个建议和希望，请北京大学花点力量，搞一个组织，建立个基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论著整理出版。像从梁启超、胡适开始的这一代学者，留下了不少东西，由于抗日的战乱和文革的浩劫，很多材料不易搜集。这次出版的《潘光旦文集》，无论在材料搜集和文章的校勘、校对方面都下了功夫，可谓精品，希望很多老一辈学者留下的东西也能像潘先生的著作一样都能整理出版。

中国文化正处在大变化的时代，要了解这种变化要通过读每一代知识分子写的东西。潘先生属于这大变化的前一段，就社会学界看，陈达、吴景超先生等的遗作也需要整理。我们需要看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处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之中，自身也在变化，我们可以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中研究中国文化的变迁。这一笔帐总是需要结的。我们从中会看到前一代人是如何走过来的，结这个帐，大有好处，这是一个传统的继续。

正因为这个道理，在座的也要整理自己的东西，它对于将来都是宝贵的，能写的都要写出来，为了给将来的人看，每个人都要参与，不要妄自菲薄，因为这一代人也代表了一个时代，时代在变，这些变化会有所表现，我们写出来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反映变迁的东西。

下一代人也要准备写，现在条件好了，每个人都可以写，这不是个好坏问题，而是它代表了各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时代借我们的手所写下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到文化如何变迁、如何传递，每一代人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所以我建议把这个能看到时代变迁的“大文库”搞起来，对上一代人的遗作是抢救性的，需要抓紧，而对后继者，只要重视，应不成问题。当然我很赞成北京大学提倡的精品意识，要出就要出精品，无论作者、编辑者、出版者都要为此贡献一份力量。

#### **王学珍（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潘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西南联大的教授，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因此，他也是北大的教授。三校复原后，他回到了清华。我是北大的学生，所以没有听过他的课。只是 1947 年在北大四院（今新华社所在地）听过一次他的讲演，题目和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在开始讲演时画了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是“人”。他说：天上，地下，前、后、左、右都需要了解，也都有人研究，现在了解、研究得也还不够，但是了解得最少、研究得最不够的是十字中心的“人”





自身。这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大家对潘先生都很敬仰。后来社会学被取消了，直到 1979 年才又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重建和恢复。我是 1978 年才恢复工作，北大在 1980 年底开始筹建社会学专业。1987 年（当时我任北大党委书记）有的同志向我反映，潘乃穆准备退休去编潘先生的文集，反映者表示不同意他退休。那时我考虑这项工作很重要，而且社会学学科刚刚恢复，先驱者的论著需要整理介绍，应该支持她的志向，所以我就同意她退休了。

编文集很不容易，它似乎不算学问，实际上这项工作非常烦琐，也很有学问。我们编过《李大钊文集》，编过北大史料和西南联大史料，文字的核对工作方面就有争论，有些与现在的用语不合适的词语，要不要取消或更改，如李大钊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论著中有些词汇，李大钊用它时的意思和现在人们了解的意思不一样，如不弄清楚，现在的人看不懂。为此我们曾专门请有关专家来研究。但原来的文字我主张保持历史原貌，不予改动。

我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很不容易，潘先生的著作不仅对社会学有用，对其他学科也有用。我也很赞成费老关于出版前辈学者文集的建议，可以选择一下，逐步来做。

### **李崇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学术部主任、《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编辑部主编）**

潘光旦先生是我国最早的优生科学家，他于 1926 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宣传并身体力行于优生科学事业。他先后出版发表过许多关于优生学的著作和论文。这次北大出版社发行的先生文集 14 卷中，直接论述优生学的就有 40 余篇，如《优生概论》、《优生原理》、《优生与民族健康》、《宗教与优生》等；他还先后编辑出版过优生杂志，如《优生月刊》、《优生副刊》（华年周刊）等。潘光旦先生还是最早在各大学开设“优生学”课程的教授、除 20-30 年代在上海各大学（大夏等）讲授此课程外，于抗日战争前后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都开设过优生学课程。至今许多生物、医学毕业的学生，都曾听过先生的优生学课程，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极大的影响。例如天津医科大学马泰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听过潘先生的课，还当过优生学的课代表。现代我国医学遗传学开拓者之一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李璞教授，在清华大学曾选修他的课，这对他以后走向医学遗传学有一定影响。

我国优生学的发展，如果说从先生 1926 年开始宣传至今，已有 70 多年了。如果从先生在各大学校特别是清华大学开设优生学课程算起，也有 50 多年了。解放后，由于二战时优生学曾被法西斯德国所篡改和利用，并被利用作为杀害犹太等民族的借口，故战后世界各地大多不再直接使用“优生学（Eugenics）”一词，其科学的内容多改变为“出生缺陷预防”、“产前诊断”。美国战后曾有人主张新优生学，内容为“遗传咨询——产前诊断——人工流产”。在日本至今仍沿用“优生”一词，并有《优生保护法》。在我国台湾的一些医疗中心里，多设有优生遗传中心。在英国至今仍仍有“优生学会”，1982 年该学会召开了优生学创始人 Galton 诞辰 75 周年纪念会，会上由高氏的侄女 Middleton 女士作了纪念报告，曾提到“Galton 是一个在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方向主要的先行者，他强调了人口的质量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述的要求还更多”。当时我曾写信给《光明日报》驻伦敦记者孙文芳请求联系，以后他曾带给我一些优生学会的现代资料。这说明潘先生介绍的优生学在英国还在活动。

斗转星移，直到 70 年代末，随着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提出“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少生、优生”的政策，优生概念重又浮出水面，1979 年 12 月在长沙一次医学遗传学成立大会上有人提出优生学问题，而就在此时，学者们便想起了解放前的潘光旦先生在优生学方面的贡献。1981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潘先生的旧著《优生原理》，遂引起国内优生



遗传学界新的重视。

自 1979 年长沙会后，我个人便产生寻找潘先生优生著作的想法，曾来北京原北图（文津街）找到部分资料，至 80 年代初，我曾撰写了关于我国优生学过去发展历史的几篇文章，但仍感不够，许多已知的文章没有找到，如《二十年来世界之优生运动》、《宗教与优生》、《优生与抗战》等。1981 年我专程来北京，由中国人口学会、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天路介绍到中央民院图书馆查阅资料，当时一位年长先生说这些资料目前均交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保管，他的丈夫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我即到鼓楼西大街找到王庆恩，他在办公室接待我，并说乃谷已去美国进修，只有等她回来再说。

直到 90 年代初，我来北京中国优生协会任副会长兼学术部工作，方与北大社会学系潘氏两位女教授认识。1999 年恰逢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潘光旦文集》（第 5 卷），获乃穆、乃谷二教授赠我《文集》，喜出望外，几乎通读，对潘光旦先生的优生思想，才有了较深的体会。虽然在先生 100 周年华诞时写了几篇关于先生优生思想的探讨论文，但终因才疏不能窥其全豹，但有了这新的 14 卷《文集》，我将深入学习，从此宝贵文库中挖掘其关于人类发育即生存发展（位育）的科学真谛，为中国的科教兴国提供点滴资料。

## 《潘光旦文集》编辑经过

潘乃穆

首先向各位汇报一下搜集、整理和编辑潘光旦著作的简要经过。

关于潘光旦著作的总量，原先我们粗略计算是 600 万字左右。结果《潘光旦文集》14 卷实际编入了 640 万字，余下未编入的部分还有中文约 100 万字（包括书评、短评、译文、杂钞等）、英文文章约计 400 页，提纲及卡片等尚未计在内。

从开始搜集作者的著作到《潘光旦文集》全 14 卷的出版，从 1978 年底开始到 2000 年底为止，前后经历 22 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78 年底到 1991 年，这段时间主要进行搜集工作；同时想要尽先出版他没有发表过的遗稿。1978 年底在费孝通先生倡议之下，潘乃谷由内蒙古借调来京，开始搜集整理潘光旦的著作。1979 年春邓小平、胡乔木指示重建社会学学科，潘乃谷随同费先生参加学科重建工作，搜集整理潘著只好成为我们业余的工作。1988 年潘乃穆退休以后，才得以集中精力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在此期间，出版过几种潘著：《优生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旧著重刊，1981 年）、潘乃穆、潘乃谷整理《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一次印刷，1988 第二次印刷）、胡寿文合作《人类的由来》译注本（商务印书馆，1983 年）、胡寿文重校《性心理学》译注本（三联书店，1987 年）、中央民院吴丰培先生推动的《铁螺山房诗草》影印本（群言出版社，1992 年 1 月）。还初步整理了《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译注稿。

1992 年在潘光旦的著作大体收集齐的基础上，在得到潘光迥、袁勃等先生资助出版经费的条件下，我们和当时北大出版社总编辑苏志中先生商定出版《潘光旦文集》，确定了总体计划。1993 年初第 1 卷交稿，当年出版。从 1993 到 1997 年陆续交稿至第 6 卷，出版至第 5 卷。第 6 卷录排

